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 专题概述

(讲授纲要)

西南交通大学德育教研部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 专题研究

（编委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 专题概述

(讲授纲要)

西南交通大学德育教研部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目 录

前言	(1)
----	-----

一、什么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	(1)
------------------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17)
-------------	------

三、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	(50)
-----------------	------

四、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书	(56)
------------------	------

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	(57)
-----------------------------	------

专题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59)
-----------------------------	------

一、共产国际与大革命的兴起	(59)
---------------	------

二、共产国际与大革命的高潮	(63)
---------------	------

三、共产国际与大革命的失败	(77)
---------------	------

附录：	
-----	--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80)
---------------------------	------

二、斯大林：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	(83)
----------------------------	------

三、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97)
----------------	------

四、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	(105)
--------------	-------

专题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110)
-----------------------------	-------

一、共产国际实行政策转变和黎澍白的“左”倾冒险主义	(110)
---------------------------	-------

目 录

导言	(1)
----------	-----

一、什么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	(1)
二、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	(1)
三、学习和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的指导思想	(2)

附录: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3)
专题一,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11)
一、共产国际的创立及其组织特点	(11)
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25)
三、共产国际推动国共合作的建立	(33)

附录:

一、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44)
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47)
三、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	(50)
四、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56)
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	(57)
专题二,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59)
一、共产国际与大革命的兴起	(59)
二、共产国际与大革命的高潮	(69)
三、共产国际与大革命的失败	(77)

附录: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90)
二、鲍罗廷: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	(93)
三、斯大林: 论中国革命底前途	(97)
四、斯大林: 中国革命问题	(105)
专题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110)
一、共产国际实行政策转变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	(110)

二、共产国际政治上“左”倾和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120)
三、共产国际与王明的“左”倾错误	(131)
四、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41)

附录:

一、《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摘录	(153)
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摘录	(159)
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农民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摘录	(171)
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摘录	(178)
五、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	(183)

专题四,抗日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一、抗战初期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援助	(185)
二、共产国际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186)
三、苏德战争爆发前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192)
四、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阶段	(195)
五、共产国际解散	(199)

附录:

一、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会议上就中国问题的发言	(204)
二、斯大林对崔可夫的谈话	(206)
三、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提议书	(207)
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209)
五、毛泽东同志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211)
六、共产国际结束声明	(214)

专题五,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共产国际

一、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最初结合——毛泽东思想萌芽	(215)
二、毛泽东思想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	(220)
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226)

附录: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主要人物介绍	(230)
-----------------------	-------

导 言

一、什么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

1.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共产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六日成立——一九四三年六月十日解散)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联合组织,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的。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案》,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领导,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为止。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它的发展成长也同共产国际分不开。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同共产国际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党内错误路线的发生,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错误,都在思想上或者也在组织上同共产国际有一定的联系;党内错误路线的纠正,中国共产党内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起了重要作用,但共产国际也是有功劳的。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2.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是历史科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中国现代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上三门课的一个分支。所以,学习和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历史作用。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事实上不能进行研究。因此,这一问题在教材里、课堂上还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使得许多问题变得非常费解。

3.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研究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要研究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共产国际的历次会议;研究和共产国际有关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

二、为什么要学习与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

在历史科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中,所以要阐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归根结底是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本来面目所决定的。

1.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客观历史发展进程,涉及我们党历史上路

线、政策的是非,涉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因而弄清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对于正确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总结历史经验,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都具有重要意义。学习和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总结历史经验,不但可以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有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了解,丰富知识,而且可以受到生动的毛泽东思想教育,深刻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提高思想觉悟。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①但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是有国际条件的,在理论上是同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和斯大林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无产阶级领导权、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武装问题的学说分不开的。这些学说都是在共产国际会议上提出来的,又是通过共产国际组织传送到中国来的。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从来就不是与世隔绝的。

2.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还涉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功与过,涉及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争论。因此,学习和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不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而且它的历史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弄清这个问题,对于理解今天我们党对外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也是很有帮助的。

3. 当前国内外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概况

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外国比中国早,他们的研究很有成绩,特别是在资料积累和整理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无论是苏联的历史学家,还是日本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他们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而且,如果只有美国、苏联、日本的历史学家研究,没有中国同志的研究,无论如何不能深入下去,因为中国掌握了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资料的一个方面。

在国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才开始成为人们重视和从事研究的问题。近20年来,研究工作展现出极其广阔的发展前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三、学习和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的指导思想

学习、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的目的在于科学地阐明中国革命的历史,正确地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所以,学习、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实事求是地论述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

学习、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要以党的文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论述为指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②又指出:“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③在毛泽东同志的一生中,对共产国际作过许多评价。例如,他曾经指出,世界“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④他讲过共产国际对中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的帮助。⑤他讲过共产国际与日益成长着的各国党之间的矛盾。⑥他还讲过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所犯的一系列错误。⑦此外,他对共产国际作过“两头好,中间差的评价。”

学习、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既要严肃、慎重,又必须解放思想、面向实际。

注: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第40页。

②同①,单行本第1页。

③同①,单行本第4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页。

⑤、⑥《毛泽东同志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摘要),《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

⑦《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6页。

附录: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这是周恩来于1960年7月14—15日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做报告的节录)

中央常委要我讲一下国际关系,主要是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关系。

我先概括地讲六点看法:

一、共产国际的成立和解散,都是必要的。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一九一九—一九四三),三个八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共产国际的成立,当然是必要

的。它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各国党成长了,成熟了,共产国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共产国际在建立的初期,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那时,尽管列宁有那么高的威望,但共产国际是民主集中地决定问题的,各国党的代表可以纷纷议论,各抒所见,非常活跃。共产国际划清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界限,也批判了“左”派幼稚病,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动员了各国革命人民拥护苏联,支持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革命运动。

共产国际的解散也很适时。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作了一个决议,说对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不要去干涉,以后也的确放手了一些。但是这时,共产国际的存在还需要,它在反法西斯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到了一九四三年六月,共产国际就解散了。

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在中期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

这是对共产国际的一个粗浅的总评。

二、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要在实践中总结自己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中国党的经验很丰富。中国党虽然犯过几次“左”的和右的路线错误,但也有很重要的正面的经验。

三、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有可能避免国际的坏的经验在本国重犯,使国际的好的经验在本国得以发展。据我所了解,不独立思考、盲从迷信的人是很多的,破除迷信、独立思考是很不容易的。当然独立思考并不等于狂妄自大,唯心武断,拒绝国际提出的好的意见。陈独秀是狂妄自大、唯心武断的。李立三同志也是这样,他提出夺取武汉,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全国胜利的开端;打下武汉再和共产国际算帐;中国革命起来了,要苏联出兵;中国革命胜利,英、美、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都要濒于末日,世界革命就会起来。现在立三同志看一看这些话,他自己也会发笑的。

四、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毛泽东同志说,两个大国的革命胜利,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时候取得的。在现在的情况下,成立国际组织,相互间总是不容易做到平等。不仅在政治上,就是在经济上也是如此。

五、研究国际的经验,要全面地看问题。斯大林管事的时间长,缺点错误多一些,但是在斯大林那个时期也并不都是不好的。就是在共产国际中期和斯大

林的晚年,他也是支持革命的多,不许革命的少。我们顶一顶,他还是可以接受一点意见,也可以含蓄地承认一点错误。他的怀疑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斯大林还是讲理的。当然,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错误,但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主要应该由中国同志负责,犯不犯错误主要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我们过去犯的错误已经认识了,纠正了,革命已经胜利了。

六、团结高于一切,国际主义万岁。这是原则,过去如此,现在也应该如此。所谓团结,是在原则基础上团结。有分歧,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同时批评要注意场合,要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如果批评或斗争都不生效,也需要等待,需要时间。中国党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八年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从遵义会议开始到七大,经过十年之久才解决了问题。一个党如此,何况国际?我们要举团结的旗帜。这主要是对于苏联千百万党员、两亿人民,各兄弟党的党员,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要革命的人民。

下面分几个时期讲一讲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关系。

(一)共产国际初期(一九一九年三月—一九二七年七月)。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多。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

一九一九年三月共产国际成立后,就派人到各国访贤,做工作。在中国,他们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还找过江亢虎、黄介民和戴季陶,在北方找过吴佩孚,在南方找了孙中山。中国有五四运动的基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很快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党很快地走到了群众斗争中去。这时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的次数也逐渐多起来了。一九二〇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都讨论了东方革命问题。一九二二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认真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以后就大量吸收中国的知识分子到莫斯科去学习。一九二三年共产国际作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共产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还讨论了中国搞土地革命的问题,并发来了指示。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召开三大。当时党内有“左”的和右的两种思想:一种以陈独秀为代表,认为中国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只是帮忙,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根本没有提;一种以张国焘为代表,认为中国共产党员只能少数人加入国民党,工人不能参加。实际上,这两种思想都是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党的四大决议对这两种思想都批评了,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现在看来,批评也没有重点。当时群众斗争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但是在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下,在关键问题上

掌不好舵。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国民党内的右派已经比过去嚣张得多，如西山会议派。但在此以前广东打商团，东征陈炯明等等，左派力量大大发展。当时的政策应该是支持左派，排斥右派，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但陈独秀却要让右派回去，并且要保证他们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结果右派的气焰高涨。在军事上，我们也让步。蒋介石进攻，我们党没有警惕，他制造了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事件，把我们党在军队中的力量搞掉了一部分。当时我们并不是没有力量，应该反击，但是没有反击。结果使我们党在军队中的力量仅仅留下了一个独立团，这个团到了武汉发展成两个师。北伐的时候，我们应该争取群众，争取军队。可是，这边北伐，那边上海的《向导》反映陈独秀的主张，反对北伐，说现在是军阀战争，广东不应该北伐，应该防御，应该搞群众斗争。我们党放弃了对北伐战争的领导。土地革命轰轰烈烈起来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出来了，但是党中央不支持。当时，陈独秀的确是有点怕革命，怕群众。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对中国问题作了一些不正确的分析，六、七、八三次会议对我国阶级力量的分析都有错误。特别是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会议，认为资产阶级都叛变了。到了武汉政府叛变之后，共产国际又认为，小资产阶级也离开革命了。在领导权问题上，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的时候，无产阶级的领导已经有了雏形，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共产党已经起了领导作用。本来我们应该在广东革命政权的时候就抓军队，而且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党中央在那个时候放弃了领导权。这时列宁去世了，斯大林跟他们党内的反对派斗争很激烈，对中国革命的情况不大了解，方针也不大明确。当时我国革命的中心在广东，党的中心也应该在广东才好领导。但是党的中心在上海。请陈独秀到广东去，他也不去。两个中心常常发生矛盾。直到打下武汉很久，党的中心才移到武汉。所以，第一个时期还是中国党的领导人应负更多的责任。那时，毛泽东同志的威信还没有建立，也不可能建立。当时党的领导人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也不高，还有各种派别性，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更助长了派别性，这就影响了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发展。

（二）共产国际的中期（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三五年七月）。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基本上是错误的，对我们中国党影响最大。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政府叛变革命，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破产。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七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央来信。这封信强调了革命的前途，而对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分析得不正确，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叛变了。对革命的任务，提出了七条：第一，退出武汉政府；第二，发表宣言；第三，不要退出国民党，在国民党内搞左派；第四，工人斗争；第五，武装工农；第六，党可能转入地下；第七，反机会主义。这七条，对搞军队、搞地方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没有重视，而当时恰恰应该是搞军队、搞地方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

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联系到组织问题。共产国际派来的鲍罗廷直接干

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组织了一个临时中央常委。这是仓促通过的。七月十三日中央有个声明，只提了退出武汉政府。当时我们党还有一点武装力量，如叶挺的部队，所以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目的是南进汕头，占领海口，然后到广州。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单纯军事行动，中心是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当时，共产国际派了几个人来，在罗米那兹的指导下，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在反对机会主义这一点上是痛快淋漓的，但在怎样跟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深入群众斗争，建立军队、政权、根据地这些重要问题上没有作出正确的总结和指示，没有提出明确的任务。张太雷到汕头给我们传达八七会议，只批评了机会主义，没有提出如何做的问题。我自己当时是城市观点，没有从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取得经验，上山搞农村斗争。

中国革命失败，反对派攻击斯大林更凶。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连写了几篇文章驳反对派，其中对中国革命的理论的分析，形势的估计，许多是不合实际的。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先后都离开革命阵营了，但是中国的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并且有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在共产国际、斯大林的理论分析和形势估计的影响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就搞了盲动主义，号召到处暴动，认为革命形势还是高潮。在组织上，处分了不少人，最主要的是开除谭平山，对毛泽东同志和我们这些人都有处分。十一月中央会议决定组织广州暴动，他没有明确的方向。参与指导广州暴动的有一个德国人，还有一个苏联人。广州暴动失败，太雷同志牺牲后，中央把立三同志派到香港去领导广东的工作，这时是盲动主义的最高峰。盲动主义在广东搞得最厉害，广东干部牺牲是最多。当时的路线，根本没有接受上海、南昌、广州暴动的教训，仍然要到处搞暴动，结果使革命力量特别是白区革命力量受到了很大损失。当时在组织上还搞了一条，叫做领导干部工人化，使领导机关更加混乱，宗派性增加了。这个根也是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的。

现在讲一下中共六大。六大是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的决议召开的。中共有一个代表团，其中有向忠发等人，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六大的召开，首先去的代表就有问题。当时强调工人化，在七十五个代表中，有四十一个工人，后来叛变的十六个代表中，有十四个工人。当时共产国际指导六大工作的人，一个是布哈林，还有一个法国同志，还有陶里亚蒂，但做实际工作的是米夫。在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只强调工人成份，中央委员二十几个人中，很多是工人，而当时党内真正有威信同志有些没有被选入。会后，瞿秋白、张国焘留莫斯科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六大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任务（反帝反封建）等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阶级关系等问题则作了不正确的分析，认为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叛变革命

了。在土地问题上，只提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农民代表会议处理；对军事问题没有强调指出。六大后，中山大学里以王明为首的宗派，集中力量反对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中山大学是一九二五年在莫斯科创办的，米夫做副校长，吸收了大革命时期党的一些干部和青年去学习，其中有王明这么一些人，还吸收了国民党的一些左派。在中山大学内，宗派斗争很厉害。六大后，中山大学的宗派斗争继续发展。王明宗派反对中国代表团，实质是反对党中央，认为中国党的中央不行了，要换人。到了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再加上联共（布）清党的影响，就搞得更混乱了，对有一点可疑的就开除，还流放了一部分。

六大以后，共产国际派了一个波兰同志和一个德国同志来中国。到了一九二九年，共产国际陆续来了四封信。第一封信的内容是反右倾，第二封信的内容是反对联合富农，第三封信的内容是赤色工会公开，第四封信的内容是反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和第三种力量。这四封信，对立三路线都有影响。第四封信就号召中国搞政治罢工，准备革命，说直接革命形执快到了。

我一九三〇年三月动身去共产国际。七月，我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在中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很重视。当时产生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国际的决议还附了东方部的六个决议。斯大林说，这么多决议拿到中国太多了，作为草案拿去吧。国内，六月十一日产生了立三路线。立三路线提出，要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全国革命的开始。同时在全国布置暴动，并提出夺取武汉、南昌、长沙等大城市的计划。后来打下了长沙，于是在八月一日、三日，在上海连着开了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立三说，打下武汉再和共产国际算帐。立三路线持续时间只有三四个月，但使很多地方的党组织受到很大损失，所以，九月就开了三中全会。三中全会还有“左”的东西，因为三中全会是传达共产国际上述决议案的。会上，向忠发和我做了报告，秋白做了结论，立三发了言。会上对立三的批评很尖锐，不过后来在会议决议上写的并不那么尖锐。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错误，例如批评了何孟雄，也批评了陈绍禹（王明），这些批评，也有对的，也有错误的。三中全会补了一批中央委员，就是没有补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向各地派“钦差大臣”，从三中全会就开始了。当时，共产国际说中共中央不重视苏区，所以中央就往苏区派了不少人，使苏区受到了影响。

一九三〇年十月共产国际来信，说中央不对，是调和路线。王明他们就闹起来了。米夫一来，更造成了党内的危机。王明写了小册子，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撤换中央的领导。所以，召开了四中全会。四中全会，我们起草了决议，不被采用，米夫自己起草了决议。三中全会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四中全会也是根据这个决议案的，再加上国际的信，用极左反对立三路线的“左”，作了决议。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小册子更加发挥了作

用。他站在更“左”的立场来反对立三的“右倾”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形成了更“左”的路线，再加上中央几个负责人叛变，使我们党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一九三一年八月，米夫回去了。共产国际的八月决议批评了三中全会，说四中全会后，中国党更加健全了。实际上，四中全会后，中国党更加混乱了。四中全会把我保留在政治局，把秋白去掉了。以后，王明到共产国际，张国焘、陈昌浩到了鄂豫皖苏区，我到了中央苏区。当时，中央只留少数人，多数派到各地去，抓各地的权。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临时中央。这个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是批准了的。临时中央有一个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又有一个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当时要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要求攻打中心城市，对于正确的同志，如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指责他们“右倾”。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领导被取消了。一九三三年又反对罗明路线，反对邓、毛、谢、古，正确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当时在军事上有了李德，他虽然是个顾问，却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他和博古的军事路线相合，一直搞到遵义会议。当时的军事路线执行的结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现在看来，当时不退出江西是不可能的。到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才在军事上纠正了错误路线，挽救了中国革命。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有了遵义会议，虽然长征中受了损失，又遇到了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但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战胜了狂风巨浪，克服了党内的危机。

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导在中期是有很大错误的。中国党在这个时期犯了那么多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了那么大的损失，我们中国人当然要负责，但与共产国际有很大的关系。

（三）共产国际的后期（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三年）。

这个时期，中国党与共产国际联系少了。一九三五年七八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更多地注意国内问题，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领导。当时通过了一个决议，说国际执委会要把工作重心转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当时，共产国际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国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结合。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西安事变，我们处理得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时期，中国党由毛泽东同志当家了，但是共产国际对我们中国党还有影响。主要的问题是第二次王明路线。一九三七年年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说他跟斯大林谈过话。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中国优秀青年的总汇。王明回来后，主持了长江局，蒙蔽了一批

人，搞了第二次王明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虽然时间不长，但对北方，对新四军，对上海，都有影响。第二次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不无关系。斯大林信任王明，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关系也好。后来我去莫斯科对季米特洛夫谈王明的错误，季米特洛夫听了还表示惊讶。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在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局面。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很多干部逐渐觉悟了，王明就逐步地孤立了。当时蒋介石也不要王明，连个部长都没有给他当。毛泽东同志说，要是给他一个部长当，也许情形更坏。

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由于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件，资本主义各国党处境很不利，思想也很混乱。毛泽东同志九月一日有个《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我把它带到共产国际，发给各兄弟党。共产国际很称赞，说中国党领导正确，给了他们很大支持。

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内部事务还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组织上也还有些干涉。但这个时期比共产国际初期对我们党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来战争打起来，对我们党的干涉就很少了。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就解散了。

专题一,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一、共产国际的创立及其组织特点

(一) 共产国际创建的历史条件

1. 共产国际诞生前的两个无产阶级国际组织

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在它创建之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曾建立过两个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

19世纪60年代,随着欧美工人运动的高涨,各国工人阶级迫切要求在国际范围内建立有组织的联系。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会堂举行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爱尔兰等国工人代表出席的群众大会,决定建立国际无产阶级群众性政治组织,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这个组织在第二国际成立后,被称为第一国际。

马克思是第一国际奠基人之一,也是第一国际革命活动的灵魂。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成立大会上是主席团成员,后被大会选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德国通讯书记。马克思亲自起草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为第一国际规定了革命纲领和组织原则。《成立宣言》明确规定,第一国际的历史使命是组织和领导各国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并且强调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共同章程》宣布,第一国际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并且规定了民主制和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它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为总委员会。

第一国际成立后,先后举行了五次代表大会、三次代表会议和多次总委员会会议,讨论国际工人运动的各种重大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议。第一国际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下,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队伍,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展开了对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毫不妥协的斗争;阐明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纲领和策略原则;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工人运动骨干;在欧、美、非三大洲18个国家中建立了支部,拥有会员约40万人。它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下,发扬了无产阶级国际